

新时代国际经济 发展与合作

| “一带一路” 倡议 |

[印] 阿马蒂亚·森 刘民权 夏庆杰 等◎编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时代国际经济 发展与合作

| “一带一路”倡议 |

[印] 阿马蒂亚·森 刘民权 夏庆杰 等 〇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时代国际经济发展与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印）阿马蒂亚·森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6
ISBN 978-7-300-25799-0

I. ①新… II. ①阿… III. 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文集 IV. ①F1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2685 号

新时代国际经济发展与合作：“一带一路”倡议

[印] 阿马蒂亚·森 刘民权 夏庆杰 等 编

Xinshidai Guoji Jingji Fazhan yu Hezuo: Yidai Yilu Changy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22 插页 2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95 000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2016 年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开局之年。在世界上实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值得期待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构建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全球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在国际社会不断讨论如何提高国际发展援助的有效性之际，新兴国家的投资、贸易和援助正在成为发展领域的重要力量。中国适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这些国际发展领域的重大举措，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从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视角来看，可以说今后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需要“一带一路”倡议。

近十多年，国际社会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可能给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带来了不确定性和挑战。西亚与北非一些国家的混乱、内战和恐怖事件不断，由此产生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潮水般涌向欧洲各国。一些学者认为，难民潮和恐怖事件击碎了欧洲人的国际化梦想，导致了欧洲各国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抬头，直接后果是英国脱欧以及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可能脱欧。拉美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政治上的不稳定，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和发展目标的实现。此外，一些学者认为，特朗普当选后的美国要重振美国制造业和强化贸易保护主义。这些事件都可能导致 2016 年后的欧美国家更加内卷化，它们有可能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和援助，转而更加集中力量解决自身的经济治理问题。

PREFACE

序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成立了很多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和摆脱贫困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还有一些区域性发展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此外，各主要发达国家还有各自的政府双边援助机构。可以说，这些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并消除极端贫困的机构，在全球发展与贫困治理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当人们面对当前依然约有十亿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他们缺医少药、食不果腹的现实时，自然会反思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的有效性。针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的低效，一些西方发展专家如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教授甚至宣布了西方国家援助政策的彻底失败。援助是否有效是一个有待实证评估和检验的问题，但毫无疑问，面对共同的发展目标和挑战，我们需要建立更加广泛而平等的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高速增长，2010 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工厂。8 亿多中国人口成功摆脱极端贫困。中国取得增长和减贫“双重奇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曾指出：“我认为，世界能从中国获得的最大收益就是向中国学习。中国提供了许多经验，但实际上没有被注意到，有时我认为这些经验甚至在中国也没有得到认可，所以我们应该强调这一点。”从制度安排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经验，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和关注：（1）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全稳定的国内外环境；（2）在社会政治经济架构中允许各种所有制的工商企业和企业家的存在和发展；（3）农村土地的公平分配，以及劳动力相对自由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繁荣；（4）大众教育体系提供了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大量白领职工（技术职工、管理人员、销售人员、工程师、科学家、会计师、律师等）；（5）产品市场的存在和正常运行；（6）一定程度的产权保护；（7）相对稳定的金融体系等。中国的成功发展经验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

条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

在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诸多新的挑战的今天，中国和众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进步的一个现实途径。工农业发展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彻底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仅工农业发展落后，工农业生产赖以存在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交通、通信、电力、能源）也严重落后。中国在其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一直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应该优先发展。正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先期发展起来的中国也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其他国家实现合作共赢。除了中国之外，其他新兴国家也积累了丰富的丰富的发展知识和经验。只有充分总结和分享人类社会关于发展合作的知识财富，才能更加有效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自 2015 年起，旨在促进南南发展合作的“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和北京大学刘民权教授、夏庆杰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开始就南南合作问题进行合作研究。2016 年 2 月 25 日在北京大学举办（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构建包容高效的国际发展援助与合作体系”国际研讨会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阿马蒂亚·森教授就中国发展经验做了主旨演讲。在 2015 年 11 月 4—6 日北京论坛经济分论坛上，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邀请的很多专家学者，如英国国际发展部的首席经济学家兼牛津大学教授斯特凡·德尔康（Stefan Dercon）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牛津大学阿德里安·伍德（Adrian Wood）教授、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副主席兼总干事吴忠博士、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信息中心王小林教授、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印度尼西亚 Trisakti 大学 Tulus H. Tambunan 教授、北京大学刘民权教授、北京大学夏庆杰教授、亚洲开发银行前官员 Venkatachalam Anbumozhi 博士和 Biswanath Bhattacharyay 博士、德国发展研究所（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Christine Hackenesch 博士等，纷纷就国家发展合作问

题进行了学术发言。为反映国际发展合作特别是南南合作方面的权威研究成果，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决定资助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将以上重要研究成果集结起来出版一本集子。这就是本书的由来。

吴 忠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副主席兼总干事

2018年1月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作为世界发展典范的中国及其面临的问题	001
第二章	对于贫困国家的灾难的回应：目前反思 和未来展望	009
第三章	世界各国结构转型差异：模式、原因 和寓意	019
第四章	构建公平有效的国际发展援助及合作 体系	061
第五章	绿色国际援助的发展及我国对策	083
第六章	论“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议程的演化 与前景	121
第七章	东盟—中国贸易与投资关联	141
第八章	亚洲与非洲官员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	165
第九章	在经济新常态下驱动梦想：加强区域可持续 合作	179
第十章	区域与国际机构在加强亚洲基础设施联结性 中的突出作用	187
第十一章	中国与非洲：欧盟发展政策改革面临怎样的 挑战？	211
第十二章	如何确定贫困线对于时间和空间的 敏感度？	231
第十三章	农村贫困：新背景下的老问题	265
第十四章	前瞻性最优救助资金分配方案	289
第十五章	国际发展融资理念演变分析	303
第十六章	城市化与贫困：文献综述与概念框架	319

第一章

作为世界发展典范的中国 及其面临的问题 *

我认为，此时是中国思考它与世界关系的一个重要时间点，G20 峰会将于 2016 年 9 月初在中国杭州召开是原因之一。在这个背景下，关于中国在建设国际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会有很多讨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显然在这一很短的时间内，我无法进行充分的讨论。但我想我可以从援助和贸易两个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相对富裕的国家，在国际援助上有它所关心的问题，这很正常。在国际贸易方面，具体来说在如何开发工具、如何更好地利用贸易机会、将名声不佳的全球化转变为积极变革的动力等方面，中国是一个领导者。

各方面期待中国为 G20 提供一个领导作用。这种领导作用开始于 2009 年的英国。英国所起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领导作用。当时，我们确实需要那个领导作用。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全球经济正处于自由落体式下行状态，在英

* 本文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构建包容高效的国际发展援助与合作体系”国际研讨会上所做的主旨演讲。阿马蒂亚·森的发言首先由卡沙·凯尔卡（Kasha Kelkar）根据录音整理成英文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唐琦把英文演讲稿译成中文，最后刘民权教授、夏庆杰教授对翻译稿进行了校对并为本文加了标题。

国首相戈登·布朗的干涉下，2009年4月的会议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世界经济下滑。

现在世界已经改变了，一些欧洲的思维模式不太适用于中国。例如，欧洲经济体一直痴迷于削减债务占GDP的比率。当英国的债务占GDP的比率达到70%时，戈登·布朗被指责抵押了整个英国的未来。人们不应该忘记，当英国开始建设福利国家和国家卫生服务体系时，它的债务占GDP的比率是225%，因而70%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一个极大的区别是当时的欧洲正在增长之中，它有一个增长哲学。欧洲有降低比率的信心。当哈罗德·麦克米伦告诉英国人“你的处境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时候，英国的债务占GDP的比率高于130%。现在中国的债务占GDP的比率也有点高，不过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问题。中国也不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问题。这与我的朋友印度储备银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所关心的事不同。拉詹一直在考虑银行体系获得充足资本的问题。公共债务问题是一个不同的问题，特别是因为公共债务在很大程度上与提供的公共服务有关。我认为，在许多方面，对中国而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公共服务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如教育、医疗等）来驾驭经济增长。

我认为，世界能从中国领导作用获得的最大收益就是向中国学习。中国提供了许多经验，但实际上没有被注意到，有时我认为这些经验甚至在中国也没有得到认可，所以我们应该强调这一点。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毕竟，中国是历史上“地处中央的国家”。我来自印度，这是一个西方的王国，不是主要事件的发生地，主要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这里！正如中国道教思想家曾提到的：“一个像佛陀这样伟大的思想家怎能在西方王国出生？如果一个伟大的想法出现，它应该出生在中国。”所以我认为，这是大家需要正视的历史，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中国一直建立在教育和启蒙的基础之上。在某些方面，关于佛的问题是非常模糊的。因为

佛陀也是启蒙人物，虽然来自西方王国，但他被纳入中国的儒、释、道体系之中。

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国已经发生的变化。开始时在采纳市场经济上犹豫——毛泽东虽然相信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但不相信市场经济——这也给后来人留下了改革的机会，即 1978 年的改革开放。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卫生部门的作用被低估了，虽然现在已不再是这样，不过好在教育部门的作用从未被低估。所以，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农业增长速度比世界上任何历史时期都快。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人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开始了显著的工业化进程。然而，这一进程无疑是由受过学校教育的有技能的劳动力驱动的。我认为对这一点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唯有如此，才能清楚世界其他国家包括印度应该向中国学习什么。世界变化很快。中国人突然能够生产世界上的任何商品。这就像亚当·斯密所说的，这是一种技能形成。如果你们有基本的技能、受过基本的教育，那么当你们面临挑战时，就可以解决它。随意挑选一种商品，中国人都可以制造。中国是怎么做到的呢？因为中国人能够阅读和学习，并了解什么是质量控制，这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国家从来没有实现过。

日本也属于这一类。1868 年明治维新后，日本的重点就是发展教育。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和日本这方面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我认为理解中国这个“中央王国”的一种方式观察公元 604 年的日本人。那时日本人在圣德太子（日本第一位女皇推古天皇的摄政王）的统治下，宣布《十七条宪法》，其中要求任何决定都要通过咨询，这是（英国）《大宪章》出台 600 年前的事情了。圣德太子的一个抱怨是：由于佛教是通过韩国来到日本的，大量的中国佛教文献在日本是未知的。所以虽然他因为《十七条宪法》而被铭记，但他最应该被记住的是他组织了对中国佛教文献的最大规

模的翻译活动。由于有这样的联系，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教育扩张中也有很多中国的痕迹。

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中走出来后就朝（现在）这个方向发展。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首先在农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明显，在中国，教育不仅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且是工业变革的推动力。我认为，如果不把中国工业革命与中国的教育发展成就联系起来，就不能理解中国的成功。虽然这不是关于印度的讨论，但是如果说印度在发展过程中有什么经验需要铭记的话，就是下面这一点：在拥有受到良好教育和身体健康的劳动力群体之前，印度实现工业化是不现实的。印度可以生产的商品数量非常有限。虽然印度人在全球贸易中也做得非常好，比如制药、信息技术和汽车零部件，但是不像中国，你拿给中国一个商品，要求某个工厂生产，几年内在中国就可以做到批量生产。在这方面，巴西的进展相当缓慢，墨西哥学得也相当缓慢，但中国却可以很快大规模地生产出产品。所以这是我理解工业世界的一种方式：从一个很小的故事看出背后的大故事，但这只是基本知识。另一方面，教育本身也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使更多的人识字和社会更加开化；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也将得到保留。从 1979 年到 2002 年期间，尽管中国人的预期寿命迅速提高，但如果不是这一期间中国的卫生健康系统还不够健全，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会更显著。

现在我知道，中国人都会对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提出一些批评。如果没有这些批评，中国就不会很好地秉承它的传统。但这背后的大背景就是，在中国发生的学校教育变革从来没有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发生过，学校教育影响了工业生产、社会生活、预期寿命和其他一切事情。学校教育也影响着出生率。我记得《纽约时报》说过，把荣誉归于一孩政策是一个错误。不过，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中国家庭的生育率高于 5。但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的十年中，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从 5 下降到 3 以下。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变化？显然

这不是计划生育政策所致，因为它还没有实施。其实根本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接受教育和就业。其内在的联系是这样的：过多的怀孕和照看孩子对年轻女性而言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劳动，所以任何增加年轻女性关于家庭事务决策权的机会都会导致生育率下降。这种现象在跨国比较中也可以看到。我们在印度做了详细的研究，比较了超过 450 个地区的生育率变化状况，结论也是如此。只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生育率下降：女性所受教育和女性的有报酬的就业。

中国女性生育率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就已经大幅下降。当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时，中国女性的生育率已经是 2.8，现在是 1.7。而在 1968 年和今天之间有一个缓慢的变化。在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实施前的十几年里，中国基础教育水平大幅提高。

印度的一些邦已经降低了生育率，我所在的西孟加拉邦是 1.6，这个比率稍低于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较低的生育率与女性的教育和有报酬的就业直接相关。

那么，现在这些问题是什么呢？请让我先说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接下来再说两个重要的问题。

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是：我不相信任何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可以解释一个国家会突然卡在那里。整个比喻是错误的，如果你想知道，我很乐意谈论它并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不相信它。我不担心中国的增长速度放缓问题。1995 年中国的 GDP 是整个世界 GDP 的 2%，而 2015 年是 12%。如果现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慢下来，那将是惊人的。它（经济增长）不是一种细菌传播，可以被看作能够实现的事。我并不认为消费存在瓶颈。中国的消费一直在稳定增长，只是相对于快速增长的收入来说，消费收入比似乎正在下降。自 1983 年以来，几乎每年我都会到中国来。中国的消费水平发生

了巨大变化，这是我在任何其他地方几乎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瓶颈问题；它肯定不是供给侧的瓶颈问题——任何商品，中国人都可以生产出来。这是一个经济调整的问题，它需要税收制度、财政政策、激励结构和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在这些问题上我可以使用我的一些技术经济学来分析，但我不会这样做。我真的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可以使消费收入比迅速上升。

接下来我将谈到两个重要问题，对此我没有答案，这主要是因为我不知道答案。一个问题是：中国人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功地以世界没有见过的方式实现了经济发展，但是，中国能否将高收入转化为辅助社会发展的动力？我在这里提出疑问。拿一个像泰国这样比中国贫困得多的国家来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是 77 岁，泰国人是 78 岁；中国婴儿的死亡率是 11，泰国是 11；中国孕产妇的死亡率是 1.7，泰国是 1.4……我还可以继续列举出许多这类例子。现在泰国遵循的教育政策与印度和佛教有关。但是，我想问的问题是，中国结合良好的市场政策、对经济的良好理解，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在经济上变得更富足了，为什么中国在社会（发展）某些方面的表现反而不如泰国？现在，有一些问题，没有人比卢迈教授更明白问题的所在，诸如学前教育、学校营养等。所以寻找答案的一个方法就是观察社会部门的影响力，但这里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是否可以更多地利用现有的经济成就（促进其社会发展）？

第二个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并且我始终百思不得其解。我认为中国的生育率降低是因为中国女性。中国女性取得了其他国家女性无法实现的成功，但是对于男孩的偏好在中国为何仍然如此强烈？这是一个特殊的因素。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是怀男孩的概率明显高于女孩。30 年前我花了些时间才从医学角度搞清楚这个问题。粗略地说，怀孕时性别（男女）比例为 108 比 100。但

是他们出生的时候，性别比例却是 105 比 100，或者是 95 个女孩比 100 个男孩。^① 在德国、英国、美国及其他地方都是这个比例。这一比例在 94 到 96 之间波动，大约是 95。在印度，它是 92.6，但是在中国，却是 84.7，这完全是由于选择性堕胎所致。既然中国女性在教育 and 就业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为什么中国仍存在异常的出生性别比例？在印度或其他国家，人们通常认为女性并不被如此看重，她们不能像中国女性一样在生活中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毫无疑问，这里有一个文化问题。即使韩国的出生性别比例（90.9）也在印度以下。印度各地的出生性别比例也有差异，这很奇怪。如果你去东部和南部，如阿萨姆邦、孟加拉邦、奥里萨邦、安得拉邦、卡纳塔克邦、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这个比例是欧洲水平的，在 94 到 95 之间。如果你再看看北部，如克什米尔邦、哈里亚纳邦、旁遮普邦、拉贾斯坦邦、中央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莫迪先生所在的古吉拉特邦，这些邦的出生性别比例低得多，低于 90，有时甚至低于中国的 84.7。为什么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例与印度最落后的地区相似，而不是和印度比较发达的地区一致呢？为什么促使中国女性决定小家庭模式的同样理性思维却没有改变她们偏好男孩的生育模式呢？

关于中国出生性别比例较低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每次我来到北京大学，我都想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也了解了一些情况。我希望下次我再来的时候能够得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这不是一个惊喜测试，而是一个我留给北大的同人们帮我解决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亚洲都很重要。尤其奇怪的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出生性别比例也都略低于欧洲。为什么？我们能观察到的其中有文化因素，但中国在过去克服了许多不同种类的文化障碍，为什么不能克服这个障碍呢？我给你们留下这个问题，而这

① 本章后面所指的性别比例皆是指每出生百名男婴的出生女婴数，与通常用女婴数量为 100 时所对应的男婴数来表示出生性别比例的方法恰好相反。——编辑注

个问题发生在一个已经取得伟大成就的国家里。在发展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取得了与中国同样的成就。我认为中国在 20 国集团中的主要贡献将是中国这么一个超级人口大国却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中国，印度的经济改革就不会发生。虽然有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在前，但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任何人都阻止不了。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之后，整个印度的议题就发生了变化。

所以我认为中国真的很重要。这两个问题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很重要，因为世界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很多。谢谢大家。

第二章

对于贫困国家的灾难的回应： 目前反思和未来展望^{*}

今天能在这里做演讲是我的荣幸。我想要谈谈在与贫困国家进行国际合作中的某一方面的问题：人道主义援助，也就是在一些极端灾害例如地震、洪水、干旱、流行病等中我们给予的帮助。最近几年我们从全世界其他国家学习了很多与人道主义援助相关的经验，而人道主义援助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今天能在北京与你们分享这一话题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在 2014 年，我们看到中国的医护人员在塞拉利昂帮助阻止埃博拉病毒，我们也看到近期中国在尼泊尔地震的援助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的问题是：我们能从我们应对灾害的方式中学到什么？国家怎样才能更好地应对灾害？国际组织可以做些什么？

一、全世界的抗贫动力

在我试图回答这三个问题之前，我想把对答案的讨论放在发展的大背景

^{*} 本文是英国国际发展部首席经济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斯特凡·德尔康（Stefan Dercon）在 2015 年北京论坛上的主旨演讲。作者简介：斯特凡·德尔康，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Blavatnik）政治学院经济政策教授、非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也是英国国际发展部首席经济学家。他和丹尼尔·克拉克合著了《灾难应对不力？如何提前规划》，并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